

原住民學研究理論之商榷： 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的思考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暨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教授

羅德仁

曼尼托巴大學亞洲學習中心副教授

中文摘要

原民研究中適宜採用的文學或文化理論為何？

從上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對勞工階級和經濟基礎建設的關懷，以及自由主義論述對個人自由的捍衛所帶來的種種影響，已經反映在學術界對於全球各地權利被剝奪的弱勢族群所遭遇之困境所產生的高度興趣上。此種改變不過是近三、四十年來西方學術界中，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崛起成為主流分析理論這一過程所顯現的一個面向。雖然促成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發展的歷史因素，與原民族群的歷史經驗和生存境況兩者間沒有直接的關聯，後殖民主義所關注的社會和政治現象，與原民研究所關懷的某些議題存在著若干的共同點。這點由從屬學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崛起尤其可見一斑，該研究學派由八〇年代一群研究某一後殖民主義分支的印度學者所發展出來。如喬迪·伯德和麥可·羅斯博格（Jodi A. Byrd & Michael Rothberg）已經指出，原民族群同樣被放逐於社會底層。而從屬學研究，一如原民學研究，廣泛地關注權利被剝奪

的群體所置身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處境。由於這個原因，縱使矛盾無法避免，依然有許多的理由支持以從屬學研究理論來研究分析原民研究脈絡中的種種議題。

在台灣，由於原民長期生活於漢族殖民者的控制下，華語成為原民投身學術主流時所選擇的語言，原民群體所使用的日常語言，無論是富有創意的修辭或是知識論述，皆無可避免的受到華語語境的支配。

然而，我們也藉著指出原民對華語使用的支配性被若干原民作家策略性翻轉的事實，本文試圖由華語研究中的脈絡出發來探討原民研究的理論化這一議題，也嘗試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我們提問是否能使理論原則仍在發展中的後殖民研究和華語研究，與原民研究做結合來一同挑戰歐美中心主義和漢語中心主義，並發展出一套嶄新的方法來處理原民議題。

關鍵詞：原住民族、後殖民主義、華語語系、台灣、從屬學

On the Theorization of Indigenous Studies: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ost-Colonialism, Sinology

Chiang, Bao-C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erry Russell

Senior Scholar,

Asi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anitoba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concern for the proletariat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Liberalism's discourse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have made their presence felt in heightened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plight of disenfranchised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but one aspect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have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analytical theories in Western academe over the past in the past three to four decades. Although 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ived condi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n the othe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with which post-colonialism concerns itself share a number of common points of interest with those issues of interest to Indigenous studies. This is especially so with the rise of subaltern studies, a branch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developed among a group of Indian scholars in the 1980s. As Jodi A. Byrd and Michael Rothberg have pointed out, Indigenous people have also been relegated to subaltern situations. Since subaltern studies, like Indigenous studies, deals extensively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disenfranchised peoples, it has much relev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For this reason, although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avoided, there are numerous reasons why subaltern theory is appropriately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issu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digenous studies. In Taiwan, due to the fact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long lived under the control of Han (Chinese) settlers, their everyday language, whether it be the rhetoric of creative work or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has inevitably come to be dominated by the terms of Sinitic language. Thus, Sinophone language has become the choi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as they engage with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What literary or cultural theories are appropriately applied in Indigenous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roach the theorization of Indigenous studies from within the context of Sinophone studies, and to suggest some possible lines of development. We ask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for Sinophone studies, the principles of which are just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 to join hands with Indigenous studies in challenging Euro-American-centrism and Sinocentrism to develop an entirely new manner of dealing with Indigenous issues.

Key words: Indigenous, Post-colonialism, Sinophone studies, Taiwan, Subaltern studies.

原住民學研究理論之商榷： 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的思考*

一、前言

研究原住民文學的時候應該使用哪種文學理論或者文化理論？本文試圖在華語語系的思考脈絡裡針對原住民學的理论化問題，提出一種可能性。

近世紀以來，馬克斯主義對工人階層、下層建築的關注，自由主義對於個體自由的捍衛運動或論述，影響所及，世界各個地區的弱勢族群受到學術界的關注。這是三、四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熱門分析工具的背景之一。後現代理論與後殖民理論的興起、發展歷史有其特殊條件，雖然那些條件與世界原住民族群的歷史經驗和現況原本並無直接關係，不過，後殖民主義所關注的社會、政治現象與原住民學所針對的問題由於在某些方面有諸多共同點，尤其是 1980 年代¹，後殖民印度歷史論壇衍生出的所謂的「從屬學」(subaltern studies)²，如加拿大學者喬迪·伯德和麥可·羅斯博格(Jodi A. Byrd & Michael Rothberg)所指出的，原住民長期被屈抑於底層³。從屬學，一如原民學，廣泛地關注權利被剝奪的群體所置身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處境。由於這個原因，縱使矛盾無法避免，依然有許多的理由支持以從屬學研究理論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高見，本文得據以修改，在此敬致謝忱。

¹ 見 Guha, Ranajit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² Subaltern Studies，有時被譯為底層學，但我們認為「從屬」較底層更能表達出弱勢者被支配與被壓抑的權力關係與情境。

³ Byrd, Jodi A. and Michael Rothberg, "Between Subalternity and Indigeneit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3, no. 1(2011), pp. 1-12.

來分析原民研究脈絡中的種種議題。就台灣而言，原住民族在漢族墾民的長期統治後，他們的日常生活語言，或者是創作、論述的修辭，不可避免地幾乎都以華語為中心，華語的徑路似乎是可以採用的思考徑路。

有趣的是，後殖民學的基本計畫企圖由第三世界的角度挑戰歐美中心主義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⁴與目的論 (teleology)⁵，基於語言的被使用與此一語言的政治傳統、族群不盡然等同，華語語系乃由「境外」挑戰中國中心主義。世界原住民學深刻批判歐美中心主義，一如華語語系對於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在歐美中心主義霸權普及的第一世界學術界下建構一種另類的知識論述之困難程度，用之於華語中心主義竟若異曲同工。後殖民主義，以及正在建構中的華語語系思維是否能與原住民學攜手共同克服歐美中心主義、中國中心主義，去建立一種嶄新的視野，這個視野適用於從屬階層、弱勢族群的歷史經驗，他們所面臨的各方面的文化困境。由於此一視野所牽涉的複雜性，仍有待研究。毋庸置疑，基於族群文化的特殊情境以及其弱勢的地位，原住民族要從歐美學術／華語文化的霸權壓力之下尋找其出路，不免令人焦慮。所幸，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其他原住民族一樣，都擁有著歷史所給予他們的嚴酷考驗，遂因之而薈萃其文化深度，理當具有基本的資源和能力走向正確的方向⁶。

為了闡明後殖民主義、華語語系和原住民主義對歐美／華語中心主義的批判，本文先作簡單的論述與範式比較。經由比較，我們會發現後殖民主義、華語語系和原住民學這些學術理論的衝突與共同點。其後，我們企圖從馬克斯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後殖民主義、從屬學，以及原民學在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霸權之下產生的矛盾。最後，我們以台灣原住民的言說與行動來說明原住民學如何

⁴ 想要被定義為知識，它必須是被證實的，並且必須被我們相信是真的。蘇格拉底認為這還不夠，人們還必須為之找到理由或證明。柏拉圖將知識定義為被證實的真實的信念（被相信的事物）。維基百科，〈知識論〉，（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E8%AE%BA>，2019年2月5日）。

⁵ 目的論者認為人有眼睛因為人需要視覺，即是所謂的「功能決定形式」（form follows function）。大自然裡，生物的器官順著功能而演變，功能不是順著器官而來。事件發生的最終原因。維基百科，〈目的論〉，（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E%E7%9A%84%E8%AB%96>，2019年2月5日）。

⁶ 由於本文此地談的是使用華語書寫的原住民作家，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是不能不思考的方向，特引注在此，請參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Robert Brinkley trans., “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 *Mississippi Review*, vol. 11, No. 3(1983), pp. 13-33.

繞境華語語系理論，探索邁向原民學建構的一種可能性。至於何以謂繞境，而不是直接進入或穿越，詳後文的討論。

二、「誰」是原住民族？原住民學如何理論化？

什麼樣的族群才可以被視為原住民族？目前這個極複雜、具爭議性的問題尚未看到具體的答案。大多數嘗試為「原住民族」這一概念作出定義的研究，其目的都是為建構一個國際性的合法框架來辨識現今世界中原住民族所面臨的特殊處境。然而，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們擬將「原住民族」的概念置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檢視。

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或可以這樣說，在現代國家制度運行於全世界以前，並未存在原住民族這個問題。也就是說，19世紀以前，國家（nation state）、公民（citizen）、一國一民（one nation, one people）之類的概念還未能普遍確立時，原住民族與「主流」族群的區別是沒有意義的。所有的人民都是獨裁君主（absolute monarch）的臣民。進入18、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影響之下，發展出了所謂的現代國家制度，一種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新關係從此被建立起來了：這意謂著國家這個單位是由一個族群，抑或一個民族所組成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其主要的民族，每一個民族也應該有其歸屬的國家。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積極拓展，國家制度迅速普及到世界各地⁷。

就現代國家制度的立場來看，所謂原住民族不過是某一個國家多種民族之中的一種民族罷了。然而，「原住民族」這個名詞自寓有其特定指涉，與其他民族相比，其性質有所不同。此即：原住民族具備「原住」的資格。當然，「原住」的意義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義解釋，所謂「原住」在某一地，不一定是被視為某一地原住民族的條件。就人類的起源而言，老祖宗的「原住」之地只有非洲，後來才慢慢地從非洲遷出，移居到世界各地。這是為什麼學界論述裡的原住民族，其意義不一定代表某一個族群原本的居住之地，而是指的很早以前定居於

⁷ 見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與 Geertz, Clifford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某一地的族群，他們遭遇到某一政治力較強勢、抑或科技先進的族群侵略其領土，在他們的領土上建立了一種殖民化的社會或統治框架⁸。

在這種生活、存在情境下，原住民族常常被剝削、邊緣化，面對強勢族群在經濟與政治等不同方面的重層打擊、壓抑，他們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面臨著不易保存、逐漸消失的窘況。因而，我們可以說原住民族在現代國境內一般擁有著被弱勢化、邊緣化的族群地位。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南美洲國家則是較明顯的例子。台灣曾經被荷蘭、日本殖民過，但是，歷來占人口之大部分的，掌握政權較久的，是中國移民，一般稱為漢人⁹，如同今日歐洲人後裔占美洲、澳洲人口的大多數，而原住民相形之下，變成了少數。這就是為什麼，談及當代台灣原住民族，其對照系絕不是荷蘭、日本，而是漢人。

如前所述，由於原住民族的特質，就在於他們「原住」的歷史條件，其處境便不適於與移民族群的弱勢者一起討論。為了充分理解現代原住民族貧寒、弱勢狀態的由來暨其根源，勢必要建構一種另類的論述原則。以下，是我們若干嘗試性的討論。

（一）原住民學如何理論化？

首先，我們從主流社會的立場觀看原住民族。原住民族是主流社會的「他者」(other/alterity)，因為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的不同，而且是開墾移民來到新國土所遇到的經濟競爭者，生產及科技先進的移民經常把原住民當作低等人種，用貶抑的稱謂予以謾罵，無論歐美的「savage」(野蠻人)或台灣的「番人」，原住民族是主流社會的他者，有意無意被敵視的客體。

主流強勢社會將原住民族視為一劣等的他者和客體，是故有理由，也有權力用各種方式去「協助」他們，剝奪他們的生產來源，強迫他們放棄其傳統文化與族群認同去融入主流社會，由是，原住民族的問題便消失不見。對新建立

⁸ 原住民族現當代的定義可參考 Cobo, Jose R. Martinez,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1987), p. 10.

⁹ Shepherd, J.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的移民／殖民國家而言，原住民的存在是阻止殖民國認同定位的阻礙不可忽略的事，原住民族未必然都會順從這樣的治理，儘管殖民統治權帶給他們種種與其文化傳統的衝突和矛盾，部分原住民族仍堅持以其自身的族群認同、文化習俗持續存在，這是原住民族的生存優先主義（survivance）¹⁰。

原住民族希望能繼續生存，繼續在主流社會之外與之並存，他們不得不面對自四面八方湧來的挑戰，甚至陷入一種危殆的困境，他們應如何解決主流社會所帶來的重重困難和問題？身為學者的我們也要自問，我們能做出怎樣的投入與貢獻？

學術論述有助於分析某個問題的性質與歷史根源，當代的學術論述趨向於把歷史或文化現象「理論化」。這種理論化原則上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某一種現象的基本結構，也會讓我們把不同地點、不同時代的現象作有意義的比較。不過，理論的作用是有限的，尤其在針對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經驗時，更是如此，若干美國、加拿大具原住民族身分的學者甚至拒絕採用任何「理論」來分析原住民問題。何以如此？

歐美主流的學院理論，其知識論的建構基礎皆是歐美中心的哲學傳統，影響所及，亞洲、非洲籍的學者也都採行歐美知識論的原理進行學術研究。過去，並不是沒有東亞學者指出採用歐美知識論以分析東方文化，有其明顯的矛盾現象，卻很少能像目前推展中的華語語系理論，係以東方知識論為基礎，雖然，我們很難判斷，它是否已得到廣泛認同¹¹。

對原住民學者而言，比較迫切的問題是積極反對歐美學術理論在全球學術界上的霸權。原住民族已經受夠了科技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暴力與經濟剝削。他們反抗被歐美學術論述所征服，他們要肯定族群的主體性和詮釋權，再也不願意任由主流學者曲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意義。是故，創造一種屬於原住民族、扎根於原住民族知識論的研究理論變得極為重要。

¹⁰ Vizenor, Gerald Robert, *Native Liberty: Natural Reason and Cultural Survivanc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¹¹ 見 Gu, Ming Dong, "Sinologism, the Western World View, and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5, no. 2(2013), pp. 2-9 與 Hu, Xiaoming, "Shif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n the Recent Ideological Trend of 'Counter-West Centralism'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 1, no. 1(2007), pp. 135-161.

無中生有的新創何等不易？部分學者，包括原住民身分或非原住民身分，認為當代學界已存在的一些學術理論，如果經過修改或調整，將可以適用於原住民族歷史和文化現象的分析。尤其是後殖民主義以及其中的一支，從屬學，被認為某些方面有可能用於原住民族的研究¹²。這裡先做討論的，便是這種修訂的可能性；接著，再進入華語語系理論的討論。

（二）後殖民主義的誕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各種政治與經濟因素，原來在歐美帝國政權支配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得以獲得解放，逐漸告別歐美殖民時代（帝國主義）。在此同時，戰前反對殖民統治權的一群知識分子將其焦點從反對殖民政權移轉到針對殖民主義在被解放國家的文化、社會以及經濟各方面的影響。如艾梅·賽澤爾（Aimie Cesaire, 1913-2008）、法蘭茲·法農（Franz Fanon, 1925-1961）、阿爾伯特·麥米（Albert Memmi, 1920-）等人，對殖民主義政權支配策略以及種族優越心態有犀利的批判。他們還對戰後延伸出的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進行了分析與論述¹³。

為儘快擺脫經濟，文化以及科技落後的狀況，1960-70年代開始，後殖民國家安排很多年輕人去第一世界國家學習。這些學習者大多出身工程科系，也有少數去做人文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這個階段，學者的分析對象較偏向殖民時代後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方面的負面現象。對後殖民國家來說，先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族群與母體文化的主體性是學術計畫的第一步。他們很清楚歐美中心主義的論述無法準確地反映第三世界的事實，所以積極探索其他的論述基礎。這或可以說是後殖民主義論述的誕生時代。也就是說，後殖民主義的父親是馬克斯主義，母親是自由主義，媒介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國家期待後殖民主義的誕生能協助他們擺脫帝國主義帶來的文化與社會遺毒，領導他們進入 20 世紀的歷史主流。

¹² 同註 3，頁 1-12。

¹³ 見 Nkrumah, Kwame,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lson, 1965).

弔詭的是，到目前為止，後殖民主義已經變成第一世界、歐美學術界重要學術領域之一；後殖民主義最權威的學者，也有不少屬第三世界國家人士，其主要領導人物卻都在歐美學院裡任職。對不少關心當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人士，這不過是延續歐美學術界的霸權，是一種新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史皮瓦克（Gayatri Spivak 1942-）最知名的研究報告，「從屬者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¹⁴就提到這個現象。她的報告開頭第一句便是一個弔詭的宣示：「近來來自西方最激進性的學術批判乃基於保存西方的主題的一種自私的意願，或者說，希望能保存西方為主題。」¹⁵史皮瓦克提到的「激進學術批判」，便是後殖民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印度有著堅不可摧的種姓制度，站在印度從屬層論述的對立面，她的意思明白指出，後殖民主義論述雖然把歐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當作批判客體，但是參與論述的學者大部分是歐美大學的教授。所以，他／她們攻擊西方霸權的目的基本上不過是一種跟自己對話的策略。真正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傷害的第三世界的大眾反而沒有能力參與對話。如此，殖民政權的客體在後殖民時代還是客體，而西方的學院菁英永遠是主體。

在原住民族研究裡，類似的狀況，比比皆是。不管是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還是台灣原住民學的論述，即便是帶有基進反抗性成分者，常常由非原住民身分的學者所掌控。即便是具原住民身分的學者，礙於學界的要求，通常必須先學習西方知識論的「框架」，然後，再使用這個框架進行他們的研究工作，才能獲得學界同儕的重視。儘管現今世界原住民文化研究，不約而同關照原住民知識之命題——即以原住民自身知識與世界觀詮釋世界，由於原住民族文化不以分類、分析為重心，而是以詩性為主，那些試著使用原住民自身知識和世界觀的學者，不免仍然會遭到批評，被視為「不嚴謹」或「不哲理」。因此，不管是後殖民主義，或者原住民族論述，西方學院與它的知識體系不會自動讓位給主流以外的族群或知識體系。

¹⁴ 見 Williams, Patrick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¹⁵ 今時一些來自西方最激進的批判源於自維護西方這一主體或是西方作為主題的私欲。見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收於同註 14, p. 71.

二、原住民學的使命與視野

大多數原住民族居住於後殖民的國家境內，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尼、菲律賓、印度等，這些國家都曾經被歐洲國家殖民，它們的原住民人口數大小不一。而台灣的原住民族人口以比例言，足以與美國、加拿大匹敵，它所經歷的殖民主主要為中國與日本。不論殖民主所屬國為何，後殖民國家都會將原住民族當作國境裡的少數民族之一，而國家所謂殖民經驗指的是全國性的經驗，儘管不同族群在殖民統治下的歷史經驗不一致¹⁶，最後都被納入同一的國家殖民史。台灣的殖民史就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

（一）跨國界考察：世界原住民族當下面臨的困境

邱貴芬的〈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¹⁷、廖炳惠的〈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¹⁸、陳芳明的《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¹⁹這幾篇論文或專書都曾經犀利地分析台灣人在日治時代複雜多面的自我定位與文化認同的過程、文學表現，以及族群意識。儘管部分文獻指出台灣原住民族在日本和國民政府統治下特殊的經驗，一般而言，這些學者都會將原住民族納入台灣多元族群中的一環，並不指認出原住民族在台灣境內經歷的是雙重殖民，或者內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部落社會與主流社會或核心地區之間資源、權力分配不平衡。明末清初時期，當華人方始移入台灣的部分區域進行墾拓，其時統治結構尚未完整，原住民就已經開始受到殖民統治的干擾。這種干擾，並非國家治理的直接介入，而是在民間不斷接觸中構成的，如透過原住民族母系制度，以通婚侵占土地，俗稱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或在物產交易中詐騙利益。

¹⁶ 一般並不認為美、加的狀況與印、菲受到的殖民狀態是一致的。前者的墾民人數遠大於原住民族。參見：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8, no. 4(2006), pp. 387-409.

¹⁷ 邱貴芬，〈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中外文學》23卷11期（1995年4月），頁141-147。

¹⁸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85-99。

¹⁹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17年）。

解嚴後，台灣的民主政治時代正式開始，台灣人接受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這個多元文化的範疇中包括原住民族群暨其傳統文化，對原住民而言，不能不說有所裨益，最低限度，他們擺脫了國民黨政府戒嚴時期的同化政策。不過，多元文化主義缺點是，在多元文化的條件下，原住民族與後來強制占領他們領土、進行文化殲絕，甚至導致其族人滅種活動的墾民，地位是一樣的。

容我們在這裡回到後殖民主義與原住民學的討論。嚴格說，原住民族的現況不是「後」殖民的，而是「正在」殖民狀態中，或即是「殖民ing」。現代國家制度暨其政權剝奪了他們原有的自治權以及文化主權，這種狀況就是前文提及的、典型的「內在殖民」。他們最緊迫的任務應即是爭取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權利的確認。易言之，原住民族必須先去除被殖民狀態（decolonized），才能考慮後殖民策略。

以歐洲國家前殖民地為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南美洲大部分國家，這些國家的主流族群主要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墾拓者。他們從歐洲移民到所謂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尋找更富裕、更自由的生活。從中國移民到台灣的華南墾民和商人亦是如此。他們冒著清朝政府的禁令、海域的危險，以及原住民的威脅，遠離家鄉赴台灣謀生，到現在那些移民已經變成獨立後殖民國家的多數，主流社群，同時，他們也成為國內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者。相對的，原住民族則是被他們邊緣化的弱勢族群。是一個怎樣的過程，經由何種意識型態的改變，才會使得大地的主人陡降到國家的從屬社群呢？這個問題的牽涉各種因素，十分複雜，非本文所能追究，但對它的分析應被視為原住民學的重要使命之一。

這裡，我們關注的，仍是原住民學以及後殖民學的理论對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分析。原住民學和後殖民主義一同，對歐美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以及歐美的文化目的論有全面的批判。兩種學術論述所不同的乃其理論最基礎的原則與來源。簡單的說，研究原住民族現象的學者，尤其本身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學者，他們會認為原住民族論述使用後殖民主義的條件有兩個基本的弱點，那就是它無法徹底逃避歐美中心主義的意識霸權。後殖民的學者即便身為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來的人士，仍極少使用歐美以外的哲學原理去討論後殖民的諸多現象。例

如，所謂後殖民理論的「聖三位一體」的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巴巴（Homi K. Bhabha, 1949-）與史皮瓦克，都為前述殖民地地區出生的學者，他們的理論，卻悉以歐洲哲學原則為主。由有進之，他們也全都在歐美名校得到學位，擔任教職。研究原住民現象具有原住民身分學者則較少從歐美哲學基礎為出發點，她／他們反而有意避免歐美的思想範圍。這是因為她／他們認為歐美文化的世界觀與原住民族的觀念有基本的衝突，因此任何基於歐美哲學傳統的學術理論無法反映原住民的文化，歷史經驗。第二個弱點是：多數原住民學者仍然認為他們在被殖民的狀態中，尚未進入後殖民的狀況，又以台灣為劇。

（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批判

在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興隆的現況下，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面臨的最關鍵問題主要為：

1. 恢復土地權。
2. 建立有效率的自治權。
3. 保存民族語言、傳統社會結構，以及文化承繼的方式。
4. 保持原有的自然資源，並且恢復傳統經濟功能。
5. 恢復言說的主體性與文化尊嚴。

從這裡，我們關注的主要為原住時代的共同需求，這是由於外來殖民支配權常常會引發民族的文化認同的迷惑，以及對其傳統文化的猶疑。因此重建後殖民族群的主體性以及文化尊嚴成為後殖民主義的重要使命。

加拿大原住民學者提姆·舒爾（Timothy Schouls）指出原住民族當代的文化認同衝突，然後提倡原住民在這方面需要一種「雙重推動力」（double impetus）才能全面的應付當下的文化與認同問題²⁰。所謂雙重推動力即去殖民的反抗推動力，以及後殖民主義重建文化主權的推動力。也就是說，現代原住民族社群已被墾民（後來移民／settlers）奪去了原有的土地權、經濟資源以及文化主權，

²⁰ Schouls, Timothy, *Shifting Boundaries: Aboriginal Identity, Plural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Government*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3).

他們必須要設法反抗主流墾民社會的支配權來追求自治權以及民族完整性。在這方面，原住民與帝國主義下的殖民有不少共同點。此外，原住民仍生存在殖民政權底下，他們的傳統文化習俗以及社會結構受到主流社會的種種打擊，甚至，族人失去了對母體文化的信心，自我生活的尊嚴，自自然然將身分認同轉向外來的墾民社會。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等不少國家，早期有所謂的同化政策，這種政策不外乎強迫原住民族放下對母體文化認同，直接融入主流社會。為了反對如此強制的抑或滲透性的同化壓力，並重建原住民族自身的文化與社會主體性，後殖民主義的策略有可觀的貢獻。

後殖民狀況還出現一則重要的現象，就是民族離散（ethnic / national diaspora）。民族離散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政治、文化現象，絕不是當代世界才開始出現，其歷史亦不是本文討論的對象，然而，後殖民時代族群的離散成為後殖民學的熱門議題，我們有必要稍稍探討其可能因素。

後殖民時代的族群離散主要有兩種：其一，向外離散，其二為內在離散。離散的動因大致也有兩種；自願的或被迫的。造成後殖民的族群離散，原因眾多，大致包含經濟、政治以及宗教條件。惟一般而言，離散族群來到新國家會被視為落後民族，並因此受到種族歧視而成為社會的下層階級，如法國的阿拉伯離散族群、英國的印度／加勒比海移民。

研究後殖民的學者相當關注離散社群涉及的族群認同、文化混雜的議題，這裡我們將聚焦於族群離散的經濟因素，分析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關係。

後殖民主義在歐美學院流行的時代，恰逢全球化資本主義興起。論者甚至指出兩者多方面的關聯。這個說法有什麼根據呢？民族離散，縱有各種因素，經濟條件仍是其中最重要者。眾所周知，現代全球化下的經濟制度愈來愈遵行跨國資本主義的原則發展，為了爭奪最優勢的競爭地位，跨國企業需要一群有行動力、有彈性，且又低薪的勞動力。後殖民國家貧窮的從屬階級自是被收入全球化經濟制度，他們是跨國企業的勞力支柱，為應付全球化的需求，提供勞力的族群不得不移居他國，變成先進國家的離散社群。這就牽涉到後殖民主義學者所關心的離散問題，例如文化移位、族群衝突、經濟不平等，以及文化混

雜等等。這種論述常常賦予現代離散現象正面的價值。巴巴就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引發的人口移動必然會挑戰靜態的國族論述，一國一族的理念顯然無法包容離散社群的存在。他以為這些離散社群可以引導後殖民世界踏入一種普遍文化混雜的新世代。他說：「這類後殖民和反現代的『離散』文化……亦布置其邊境狀態的文化混雜來『翻譯』，並『再銘刻』(reinscribe)都市與現代性的社會想像。²¹」我們認為，如此恐將跨國企業導致的社會、經濟、政治困境理論化，等同於正面地美化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動亂。若是，與其說後殖民主義有助於第三世界諸多弱勢民族反抗新殖民主義經濟與文化的傷害，不如說它是推動資本主義的幕後黑手。

早在 1994 年，馬克斯主義學者俞可平 (Arif Dirlik, 1959-) 便指出後殖民主義缺乏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甚至未能解釋後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除了少數例子以外，後殖民主義評論家對後殖民主義的意義和它在當代資本主義框架內的關係是未被言明的」²²。

儘管參與後殖民主義論述的主要人物多數為來自第三世界國家身分的學者，他們不欲針對資本主義帶給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以及文化的損害做任何批判。這是否與前述的理由相同，因為他們目前都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菁英學校擔任教職？

不過，俞可平能指認出其盲點，是非常具洞察力的。對於易受攻擊的原住民族社群，後殖民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默契，尤令其不安。世上所有原住民族知識分子在反抗全球資本主義之餘²³，對於占有主流優勢的歐美學院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批判，是相當負面的。原住民族的知識分子都很清楚科技化文明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以及資本主義，都是打擊原住民族文化和社會結構

²¹ Such [diaspora] cultures of a postcolonial contra-modernity...also deploy the cultural hybridity of their borderline conditions to 'translate', and therefore reinscribe, the social imaginary of both metropolis and modernity. 見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6.

²² "...with rare exceptions, postcolonial critics have been silen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dea of postcolonialism to its contex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見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no. 2 (1994), p. 331.

²³ Hall, Thomas D. and James V. Fenel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Globalization: Resistance and Revitalization*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的利器。他們知道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根本不欲開放政治抑或社會空間給原住民族和他們特殊的文化表現²⁴。

因此，原住民利用傳統族群認同以及在地文化振興活動，提高其族群自覺與文化尊嚴，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文化霸權展開反抗運動。他們也意識到所謂的傳統文化不是永遠不變的靜態體制，而是一種不斷在進化的動態結構。面臨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各種陷阱，他們拒絕接受任何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抑或民族菁粹主義（ethnic essentialism）的約束。同時，許多擁有原住民族身分的學者，並不同意後殖民主義的文化混雜論述。這是因為混雜論的前提就是中心文化與邊界文化的對立。這意謂著，混雜的過程是邊界文化在接近中心文化時，不可避免地被強勢文化的某些特質所影響，相反地，強勢的中心文化反而不甚受邊界文化的影響。艾拉·蘇黑特（Ella Shohat, 1959-）則表示，由於後殖民主義論著重身分混雜，有時候會對原住民的文化振興運動產生負面效果，她說：「由於反菁粹主義，『後殖民主義』強調混雜身分就幾近否認所有尋找共同體來源，如此等於考古學挖土探索一種理想化、但又無法彌補的過去。²⁵」蘇黑特的論點剛好指出原住民族文化的難題。對原住民而言，文化傳統乃社群定位因素之一。傳統文化與傳統土地一樣，都是原住民共同體建構的基礎。他們也明白文化是動態的，不能固定不變的。在殖民支配下重新建構共同體的過程中，原住民族群需要實質的文化特徵來定位他們自己、社群或者部落，如何與主流的墾民社會不同。如果後殖民主義的混雜論述或一味排斥文化菁粹主義，原住民恐難以鞏固其族群認同與社會向心力。

三、華語語系創作——原住民回家繞境的道路

經過前文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原住民主義有充分的反抗理由，而且，為了其族群與文化的未來命運，反抗是不得不然的。然而，為了建構其共同體，他

²⁴ 同註 23，p. 122.

²⁵ “...the anti-essentialist emphasis on hybrid identities comes close to dismissing all searches for communitarian origins as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n idealized, irretrievable past.” 見 Shohat, Ella,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no. 31/32(1992), pp. 99-113.

們要時時盤點他們在與墾民社會文化接觸時發生的混雜，更要機警地與文化菁英主義共存，在這些方面，他們有曖昧的妥協。此種曖昧的妥協其中的一個面向即展現在殖民者所使用的語言成為了文學和政治表述的主要媒介這一現況上。語言是文化表達的核心。它承載了傳統的世界觀和社會價值。然而，殖民經驗不可避免地代表了原住民族已然喪失了使用母語的場域。強制同化的殖民教育以社經主流中的語言取代了原族群的母語。最後的結果是許多原族群，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只會用殖民壓迫者的語言來表達自己。這樣對試圖推進去殖民化進展的原民學者來說，語言的選擇蘊含了各種矛盾跟妥協。接受殖民者的語言意味著必須接納另一種全然不同、有時甚至與自身的傳統文化實踐背道而馳的世界觀。辛西亞·卡斯頓（Cynthia Carsten）談論到身處在美國殖民統治下的原族群想要書寫自身經驗時所遭遇到的困境。她談到：對於熟練英語的美國印地安作家來說更為麻煩的或許是，加諸在他們身上歐美知識論中既定的假設和文類的規範，這些限制反映並支持著他們的思想。換句話說，接納他者的語言，尤其是壓迫者的語言所失去的遠遠不只有文化中的某些關鍵字。

然而，接納主流社會的語言對原民作家來說在許多其他的方面既必要也非常有效。其中最重要的是，能直接與主流社會暨其殖民意識型態直接對話。因而我們發現，世界上許多區域的原族群成為了使用非其自身母語來書寫的重要作家。很大程度上，他們的書寫挑戰了主流社會的支配，並參與了去殖民的社會工程。

泰瑞·高迪（Terry Goldie）的《恐懼與誘惑：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文學裡的原民形象》援用薩伊德對「論述」的觀點，認為紐、澳、加三個大英國協國擁有共同的原住民影像，建立墾民優越的認同感、將殖民史合理化²⁶。多莉絲·索莫（Doris Sommer）的《國族寓意小說：拉丁美洲的國家傳奇故事》指出拉丁美洲的國族寓言趨於把國家歷史浪漫化，教化人民愛戴國家暨其領袖如愛他的愛人，裨便國家治理²⁷。北美原住民伊莉莎白·庫克琳（Elizabeth Cook-Lynn）定義當代原住民族的研究為 Being（存在），是文化、地理、哲學的土著性

²⁶ Goldie, Terry, *Fear and Temptation: the Image of the Indigene in Canadi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Literatures*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²⁷ Sommer, Doris, *Foundational Fictions: the National Romances of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ndigenusness)，也是歷史、法律的統治權²⁸，原住民族的學術研究實踐必須推進這些工作事項。2006年金·史考特 (Kim Scott) 著作的《死人之舞》描述歐洲人與原住民史上第一次相遇，獲 2011 年的英聯邦作家獎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²⁹。

原住民族長期不輟的去殖民與爭取統治權的奮鬥史，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在回歸歷史敘事並尋找某一種主權的過程中，原住民文藝家打造了新文化，同時，也尊重其先人的貢獻與價值觀。

近來，亞莉克西絲·萊特 (Alexis Wright) 的《天鵝書》³⁰採反烏托邦的角度，透過生態批評 (Ecocriticism) 描寫澳大利亞原住民生活，重省原住民與殖民者的關係。J.J.希利 (J. J. Healy) 的《澳洲的文學和原住民：1770-1975》³¹討論從 18、19 世紀到 20 世紀，兩百年澳洲白人描寫澳洲原住民的立場與態度的變遷，請澳洲白人作家不要再擅自替原住民說話，應禮敬原住民作家，給予原住民作家為自己發聲的機會。

著名的台灣原住民學者浦忠成強調，雖然台灣遲至 80 年代原運，才開始出現位移與敞開，其與世界原住民族共同遭遇的困境，也在急起直追下，獲得部分解決，如屬於參政權的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屬於教育權的族語獲得教授，並進一步成為國家語言之一等等。儘管如此，原住民還需要利用各種媒體反抗主流漢人的政治和文化霸權³²。譬如，越來越多年輕的原住民以文學、繪畫、陶藝、音樂、舞蹈、運動見長，為可指認的外顯文化 (expressive culture) 當作去殖民工具。惟人們忽略的是，這些技藝固然可以納入「才華」、「天賦」的概念範疇，更重要的是，那是原住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著內隱的價值與意義³³，有關這些技藝的考證和存續，必須依賴記憶的講述、文獻資料的檢索，這意謂

²⁸ Cook-Lynn, Elizabeth, "Who Stole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vol. 12, no. 1(1997), pp. 9-28.

²⁹ Scott, Kim, *That Deadman Dance* (U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2).

³⁰ Wright, Alexis, *The Swan Book: A Novel* (NY: Atria Books, 2016).

³¹ Healy, J.J., *Literature and the Aborigine in Australia*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9).

³²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台灣原住民族研究》2 卷 4 期 (2009 年 12 月)，頁 1-37。

³³ 邁可·博藍尼 (Michael Polanyi) 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 年)，頁 60。

著內在的、被迫的離散始終存在著；因而，這些都將是原住民以文學對抗主流社會與國家時可以高舉的旗幟；這個回溯與抗拒同時是原住民自我的回歸、主體性的建構，始終是相關研究的主要論題。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知識分子在這些複雜而糾結之議題的表現或可以作為世界典範，從而以史書美所強調的「華語語系」(Sinophone) 這一個範疇，做為原住民族理論化的某一種思考的起點。「華語語系」是非歐洲中心的，它有效地指向世界各地不同的華語文學，以及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漢語創作。史氏的意指所向或許是中國／華語語系，含括兩種指涉，即華語語系的台灣與台灣的華語語系。

華語語系的台灣表達各種華語，而不只是定居殖民者的語言。它是台灣文學的一支，而不是全部；它是多語性與多音性，從羅馬拼音、閩南語、客語，乃至可能逾於十六族的原住民族語。無論從文化人類學者所考掘的地質特色、地理、族群來看，台灣屬於東亞，係南島語系的分布地。

台灣的華語語系從台灣的特殊性出發³⁴，係世界華語關係網中的一環，它是不同國的華語語系，是一種動態存在、生產再生產的，前沿、後續的垂直交疊，也是橫向的、更為龐大的互聯。不同時代、地方的華語作者如張愛玲、高行健、巴金等，他們的文學作品在中國被禁，卻在台灣得以出版、得獎，廣為傳播。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台灣是東南亞移民史與定居史相互構成的過程中的一部分；過去漢族移民受到經濟誘因的驅動，從北方到南洋，稱為「過番」；不得已而選擇定居「邊疆」，稱為「落番」，這些移民不只改變當地的文化、語言、政治、經濟、宗教等風貌，更使得族群關係開始惡化。準是以觀，不管是清代為經濟因素而移民，到台灣的墾拓或國民黨政府為政治挫敗而帶動兩百萬以上人口的大遷徙，無非都是這個東南亞史上自北而南的移動的具體化。前者造成的原漢衝突，如郭百年事件³⁵；後者帶來了省內／外的族群對立，如二二八事件。

³⁴ 史書美，〈導論：華語語系的概念〉，《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年)，頁9。

³⁵ 郭百年事件，指發生於清嘉慶19年(1814年)到嘉慶20年(1815年)水沙連地區埔里社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衝突事件。林偉盛，〈郭百年事件〉，《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

史書美與若干學者近年來所努力從事的研究，奠定了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基礎，其根本為一種嘗試，旨在「批判『華語性』霸權和其同質性」。這類的批判過程試圖把握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史氏特意不使用「離散」一詞）一方面以其所處地方的文化來定義自身，另一方面卻又反抗「來自中國為統合華語性的號召」³⁶。史氏期望透過探討曾受中國統治的非華人族群如何使用華語這一面向，包括台灣和新加坡兩地的「移民殖民主義」。華語語系這一個意圖將後殖民研究、種族研究、跨國族群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融會在一起，對處於中國和中國性邊緣的各種華語文化和群體的研究，或可以視為一種以東方文化為基底發展出來的知識論體系。

運用這樣以東方知識論體系為建構基礎的「華語語系」有助於我們對台灣原住民族所領導的一個「回歸部落」運動的觀察。史書美與本文的論述有許多態度一致之處：我們都看到，拒絕被世界所容納的開放空間是危險的，必須要從世界史的角度，將台灣放入一個世界格局中，以之探索台灣理論方有其可能性。由是突顯其既跨國、又在地的本質。史書美提出「移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是台灣理論的根本結構，由於中國的大陸性格的關係，那些無法獨立的內部殖民地無可避免地被有系統地整編進了民族國家的體系當中。也因為這個性格，使得中國的殖民地大多位在其疆域「內部」。我們注意到，台灣雖然四面環海，其殖民地卻也在其疆域「內部」；而華語語系研究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是那些被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的被殖民者及其文化。而這裡，中國只要被置換為台灣，便順理成章，無法落實部落文化、土地權、經濟模式、教育體系，而必須遵守（漢人）現代國家體系的原住民們，就某種程度來說，依然處於內部殖民的情境。

史書美認為「離散中國人」的說法並不恰當³⁷。這個反對將離散美化、正當化呼應了我們在前文針對後殖民主義所做的商榷。她同時指出，離散有其結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652>，2019年2月5日）。

³⁶ 以上兩段引號中的論述皆引自史書美，參 Shih, Shu-Mei,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vol. 126, no. 3(2011), pp. 709-718.

³⁷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第107期（2011年6月），頁5-14。

束之時（或即落地生根），而語言暨其群體（而不是語言群體）總是處於變化之中。然而，我們將與史氏商榷的是，這個觀念若對應到原住民的離散情境，情況卻恰恰相反，原住民不應在漢人主流社會的國家中持續著內部離散、或將此轉化為一種悲情的敘事美學；「回歸部落」（落葉歸根）才能代表一個離散時間的終止；離散完全不可能排除記憶，是歷史，也是價值，可以遺傳，擦掉的書寫痕跡仍在，甚至是微基因的一部分。原住民提出一個回歸的自覺意識（self-awareness），更實際付諸從城市各地返回定居、重建部落的行動。這個去而重返的過程，可以說是消極地意謂著對現代城市資本主義的轉身抽離，拒絕混雜，而回歸不只是重返的定居而已，更啟動部落文化的追尋、蒐輯與重置；他們不以離散為價值，永遠陷溺於過去，如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的大陸心態，許多人不再參與「現此時」，他們自居為放逐者，視所在之地為落後的異鄉，如：無意治理淡水河的汙染、任其髒亂；潦草建設台北市，使得這個應該是現代化的城市到處存在著類似中華商場之類的「暫居」建築，甚至擴展為便宜行事的鐵皮屋現象；千篇一律的反共復國書寫……，凡此種種，亦應歸咎於自居為「離散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尤有進之，我們並不認為離散的價值僅止於此。我們要指出的是，事實上，有部分中國人是帶著文化永遠在回家的路上，這些人以強烈若此的銘刻去形成華語語系在地化時的基礎，如台灣的眷村文學、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學；相反的，台灣原住民族則選擇面對自己的歷史，由於他們不只必須用力於語言，更需留意不斷在失去的生活世界，他們去調查、訪問，以書寫保存、想像部分元素，因而出現不少行動實踐。近來頗受矚目的孫大川（卑南語：Paelabang Danapan，1953-）以幾無瑕疵的華語寫作散文，1993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出版《山海文化》雙月刊，1994年和《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台大人類學系教授謝世忠等於屏東縣瑪家鄉籌辦「第一屆台灣原住民文化會議」。2012年在立法院直言自己不是所謂的「炎黃子孫」³⁸。夏曼·藍波安（達悟語：Syaman Rapongan，1957-）毅然返回家鄉（1989），投入反核運動（1988），他恢復族名，他潛水射魚，暗夜裡搖槳翻浪出海魚，烈日灼身之下

³⁸ 施曉光，〈炎黃子孫？孫大川：我不是〉，《自由時報》，（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86552>，2019年2月15日）。

釣鬼頭刀魚，沉浸在達悟祖先與海相依隨的故事中，極具象徵意義的回歸了母體文化，並將這些經驗凝塑為膾炙人口的華語散文、小說。霍斯陸曼·伐伐（布農族語：Husluman Vava，1958-2007）離開因為薪資頗佳而被人人稱羨的教育崗位（1996），投入了田野調查與文學創作，將布農族口傳故事、祭儀融入他的華語書寫之中，擴大其族群的可見度。漢名田雅各（布農語：Tuobasi Tamapima，1960-），布農族巒社群人，就讀高雄醫學院時便加入「阿米巴詩社」，以漢名發表諸多詩作。畢業，以提供台灣原住民醫療服務為職志，參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的籌組（1984），曾經在台東蘭嶼鄉、高雄三民鄉、桃源鄉衛生所、台東縣長濱鄉衛生所等被視為偏鄉的部落服務。瓦歷斯·諾幹（泰雅語：Walis Nokan，1961-）深具使命感，風格具泰雅族性格，雄渾、驃悍。曾以瓦歷斯·尤幹、柳翹等筆名發表文章。利格拉樂·阿鳩（排灣語：Liglav A-wu，1969-）祖籍安徽外省老兵，排灣族人混血，二十歲之後轉向母系認同，關注族群的生命禮儀、部落生活史，女性身分使得她的「認同」構圖，形構了她的文學的核心價值以及特殊性；她曾與瓦歷斯·諾幹共同創辦獵人文化雜誌，組成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後來並在原住民電視台主持「部落面對面」節目³⁹。

華語語系關注的，是所謂離散研究裡面種種帝國語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與分布。華語語系有許多非華語族群參與其中，並非僅僅是華人製造出來的文化，因而不以族群來界定，而以語言來界定，即便有時候這兩者所界定出來的結果是相同的。對於非華人族群如何使用華語這一面向，被殖民者對華語的使用，如台灣南島原住民族群，可採用類似於對其他移民社會如加拿大、澳洲和美國當地原住民所創作的英語文學之研究方法加以研究，而可以視作被殖民者透過「使用殖民者之語言顛覆殖民殖民統治」之一例。

使用「殖民者語言」書寫時，所遭遇到的困境便是身分認同和語言差異之間的糾葛⁴⁰。移居殖民主義的暴力常常被遺忘、被遮蔽，是因為這些移民過程

³⁹ 江寶釵，《文化全志·卷十二·文化志·文學篇》（南投：台灣文獻館，2009年），頁396-398。

⁴⁰ 史書美著，吳建亨、劉威辰合譯，〈何謂華語語系研究？〉，《文山評論》9卷2期（2016年6月），頁105-123。

發生在很久以前，使得人們誤以為要判斷這個國家到底是屬於誰的、語言文化應呈現何種型態變得十分困難，而其最重要的特質，便是領土理所當然占為己有，而語言文化亦肆無忌憚地以提升、進步為名的「同化」。

台灣原住民和中國「國家少數族群」之所以使用華語創作其自身文學，有幾個原因，大都與其他移民社會中存在著的原住民語的劣勢相同。在殖民力量的長期規訓之下，原住民不僅早已被迫放棄自身的語言，他們所屬的社會也零碎化了，這意味著任何一種原民語系文學的讀者變得極其稀少。一些反殖民學者如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提昂戈（Ngũgĩ wa Thiong'o, 1938-）和台灣的林聖賢強烈地主張被殖民族群必須透過有意識地選擇不以殖民者的語言創作，而藉由復興族群語言傳統來阻止自身語言的流失。

華語語系的討論相當複雜，如果研究旨在挑戰各種層級之上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台灣原民族群對華語的運用恰好落在其理論的範疇之中。透過原民文化領導人實踐其象徵性的「回歸部落」之種種創新計劃，華語首先被用作向主流觀眾傳達其動機的手段，接著則被用作挑戰、顛覆或與華語文化協商的媒介⁴¹，這便是史書美⁴²、王德威⁴³、石靜遠⁴⁴等人所談及的華語語系的曖昧性。台灣原住民於世界其他原住民面對主流社會的姿態，乃反抗與協商並存。在華語語系

⁴¹ 對於這部分，前行研究已累積豐富的成果，可參考諸如魏貽君等人的相關論述，然而，與之不同者，本文以華語語系論述此觀點，觀照這一種翻轉亦協商的行動暨其文化底蘊，同時，留意原住民有一個正在消失的生活世界，而他們的語言茲始並無文字可供書寫的事實，是以進一步不只討論其可納入華語語系的書寫，也說明族語書寫的位置，並將承載其語言的內隱知識系統，是音樂、舞蹈、儀式納入思考。這可以教我們進一步思索華語語系詮釋此觀點的獨特性與局限性。魏貽君，〈書寫的文字政變或共和？——台灣原住民文學混語書寫的意義考察〉，收於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2005年），頁283-312。

⁴²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芻議，或，「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翻譯專輯小引〉，《中外文學》36卷2期（2007年6月），頁13-17。

⁴³ 王德威的相關論述頗為可觀，如王德威，〈導言〉，收於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年）。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聯合報》，2006年7月8-9日，E7版；又見王德威、季進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2。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5期（2006年7月），頁1-4。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字〉，（來源：<http://www.cclcl.hss.ntu.edu.sg/events/TanLarkSye/Pages/DavidWang.aspx>，2019年2月25日）。他也在訪談中談及這個概念，如季進，〈華語文學：想像的共同體——王德威訪談錄〉，《渤海大學學報》30卷4期（2008年7月），頁58-64。

⁴⁴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0).

研究的宣言中(2011)，史書美敏於體受全球各地的多元華語社會以及這些社會中多樣的文化身分，她明白當代世界的華語使用並非單向——單單服務於華人族群盲目的「祖國」崇拜或著是精神回歸的渴望，相反的，一如英、法語，華語已經成為一門世界語言，不論其使用者與華人和傳統華人文化之間有何關聯，華語的使用反映出了使用者的文化處境。

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當台灣原住民族這個語言群體不得不使用主流社會的語言，同時，他們也嘗試保存自己的語言，以強調在地文化及知識的特色、絕對價值，布農族詩人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布農語：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1956-)說，沒有語言的文學書寫是不值得書寫的。沒有語言的文化是沒有希望的。族語是文學，是生活，是回家的道路⁴⁵。

除了語言，能否發現本族文化的內隱價值亦是關鍵之一。台灣原住民族族人必須體認其文化知識系統的特殊性，能自現代性的均視切割回到整體的「一」，即道家莊子所說，為天下裂以前的道⁴⁶。因而，我們更傾向於將華語語系所指涉的脫離語言或書寫範疇，並以之指向所有的再現形式，如音樂、舞蹈、運動、紀錄片等等。而始終以白皮膚為身體價值，以現代化的數理工領導教育價值，也都必須有所翻轉，才能完成去內在殖民，改變雙重殖民的處境。這亦是原住民主義繞經華語語系的關鍵。

如同詩人卜袞投入族語書寫，以恢復族語作為重建部落的方法，帶領了回歸部落與文化振興的運動，另外還有如：紀錄片導演、舞蹈家、音樂家、文史工作者不約而同先後參與了同樣的運動。

魯凱族作家，奧威尼，他決定將自己的生命和靈魂帶回家，重建一個活生生的典藏與歷史的所謂石板文化⁴⁷。同時，他也投入田野調查的書寫活動，帶

⁴⁵ 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從自我生命經驗暨其書寫探討布農族語文學創作〉(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⁴⁶ 《莊子·天下篇》：「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就歷史而言，反映的是知識系統從王官之學向百家之言的發展。這裡，則用來指知識體系的脈絡性。參莊周，《莊子·天下篇》，(來源：<https://ctext.org/zhuangzi/tian-xia/zh>，2019年2月25日)。

⁴⁷ 奧威尼·卡露斯(Auvinni Kadresengane)，《神秘的消失：詩與散文的魯凱》(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9。

著年輕人賞析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之美。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布農族詩人卜袞都在部落推動族語教育，田野調查，以及資本現代性的出版事業，對於台灣文學產生的多元化，提出補益。

阿美族馬躍·比吼（阿美語：Mayaw Biho, 1969-），是出身花蓮縣玉里鎮織羅（春日）部落的 Pangcah 裔的影像藝術工作者，拍攝多部關於台灣原住民文化、歷史與生活的紀錄片，《天堂小孩》（1997）、《我們的名字叫春日》（1997）等作品，都實質地訴求部落文化⁴⁸。

布拉瑞揚·帕格勒法（排灣語：Bulareyaung Pagarlava，前漢名為郭俊明，1972-）發現自己沒有一個族語的姓名時，他恢復了族語的姓名；當人們喊他郭俊明時，他承認並接受郭俊明那段歷史仍然存在的事實。他要求一件族服，可是也警醒地發現自己身上混搭的穿戴⁴⁹。2014年，他回到台東家鄉的嘉蘭部落，成立布拉瑞揚舞團 BDC，誓願從原住民文化出發，以排灣族圖騰〈百合〉為創作核心⁵⁰。類似的例子還有瑪迪霖姊弟（排灣語：Ljuzem Madiljin、Baru Madiljin），他們回到屏東三地門創立「蒂摩爾古薪舞集」（2006），蒂摩爾即排灣語的三地門⁵¹。

達德拉凡·伊芭（排灣語：Dadelavan Ibau, 1967），漢名塗玉鳳，南台排灣族，她在西藏轉山儀式的細節中被深深感動，而觸發了隱藏在她與族人所共有的祖靈信仰體系⁵²。她曾在部落從事母語寫作，後來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助理，從事田野調查，重新接觸長老、巫師，轉而投入優人劇場表演。在土地將收歸國有政策釋出的 21 世紀初，她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不斷地歌唱⁵³。

⁴⁸ 維基百科，〈馬躍·比吼〉，（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8%BA%8D%C2%B7%E6%AF%94%E5%90%BC>，2019年3月5日）。

⁴⁹ 郭志正，〈夢想編舞家『布拉瑞揚』〉，（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fFqVsBFk0>，2019年3月15日）。

⁵⁰ 雲門，〈布拉瑞揚·帕格勒法〉，（來源：<https://www.cloudgate.org.tw/front/staticPage/pages/about-bu>，2019年3月20日）。

⁵¹ TJIMUR，〈解碼 蒂摩爾古薪舞集〉，（來源：<https://www.tjimur.com/3529930908-3392225705292461.html>，2019年1月10日）。

⁵² 達德拉凡·伊芭，《老鷹，再見》（台北：大地文化，2004年）。我們要特別謝謝王德威、史書美在論壇中的演講、對話，給予我們無數啟發。

⁵³ 我們無意在這裡齊平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多元性，更無意將之收納與華語語系的討論之中。相反的，我們認為台灣原住民繞境華語語系回家顯示了華語語系與中國中心或協商或反抗，有助於我們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再現問題，而真正的理論建構必須另尋他途。

就前文舉列的原住民族部落、領域菁英⁵⁴，華語文仍然是他們用以創作的
主要語言，亦即，當代台灣原民的文化生產大都透過華語傳播，但，這並不表
示其接受華語文化的文化霸權，而是以華語作為媒介挑戰了此種霸權，並向主
流華語人口宣告了原民文化遺產的珍貴性和韌性。有些原民作家甚至說，殖民
者的語言反而提供他們絕佳的機會去反抗並顛覆殖民壓迫。殖民者的語言，不
論是英語、法語或華語，可經由原民文化被重塑和過濾。由是，殖民者的文化
霸權將受到挑戰，在這裡，我們略舉兩位台灣原民作家：奧威尼·卡露絲（魯
凱語：Auvini-Kadresengan, 1945-）和夏曼·藍波安，在他們的華語語系作品
中，就可以察覺到標準華語中的文學常規，甚至文法，都被作者摒而不用，他
們選擇使用從魯凱、達悟族語中直譯過來的用語、詞彙與句構。這樣的做法，
使得華語成為表達非華語文化概念的工具。華語文化傳統的中心地位因而被顛
覆，被反轉，而原民文化的價值則獲得確立。

再者，以華語文為載體，原住民族菁英幾乎是傾全力在找回他們的生活世
界，包括族語，他們的行動——返回家鄉居住，參與部落重建，都能教人們看
出他們顛覆（subversion）主流社會物質主義、資本主義、進步主義的策略，逆
反「高山平地化」的殖民政策。一方面與現代性對話，一方面也在當下的投入
中，有效地鞏固了菁粹主義，並保持其能動性，振興傳統部落文化，反過來對
主流社會發生影響力，如夏曼、田雅各、卜袞的文學、布拉瑞揚的舞蹈、伊苞
的音樂、奧威尼的石板文化、馬躍的紀錄片。他們原本要拒絕物質的消費文化、
城市現代性的離散毀滅原住民文化的傳統價值觀與自主性，卻因為這種以部落
為基礎的原住民主義同時牽涉到在地文化暨其族群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反抗，
以分享、重返與自然關係和諧共處的先民生活的方式；同時，他們也試著擺脫
墾民的壓抑，而這種種都是後殖民主義所不存在的。

在移居殖民主義的結構裡，誠然，我們要承認推翻殖民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是永遠的未來主義，但卻可以「去殖民」。去殖民不是一個隱喻，不是後殖

⁵⁴ 台灣原住民族之多元，以及集體文化表述的形式，舉例係論述不得不之惡，而所選擇的
原住民族部落、領域菁英僅係在我們有限的所知裡認為具代表性者，這一點我們在結論
裡還會續作強調。

民，也不是反殖民，薩伊德說，如果能夠去殖民的話，真正在身與心都獲得安頓，而不再離散。由邊緣、弱勢、少數出發的台灣理論，與原住民文化與文學交會，更增益其能量及批判性與倫理性的基礎。新任行政院發言人谷辣斯第一次以阿美族語 Kolas Yotaka 自我介紹，卻因為羅馬字的使用而被嘲諷，正突顯意識型態的翻轉以及理論建構之不易⁵⁵。落地生根的中國人，是華語語系的世界性基礎，而向部落回歸、重建山海價值、希祈落葉歸根的台灣原住民族，正是要藉著「地方性」的華語創作，繞境華語語系，找到返回到自己的家的道路，完成其旅程，那樣的意義超越了後殖民，可以達到去殖民，容許更多元的身分認同，達致向自我存有的本真性邁進的目標。而所以說「繞境」，是因為儘管華語語系理論於華語中心理論有所反抗、或協商，卻由於以華語作為標記不同語族之華語書寫的差異符號，而不得不帶有華語的霸權，以華語知識的必要性框架了境外的華語書寫。⁵⁶

四、結語

本文試圖評論與分析當代學院裡流行的後殖民論述立場，指出其與原住民族同異或矛盾之處，並詢問其是否有實質上的協助，同時，指出台灣原住民族繞境華語語系回家的可能道路。

本文的核心論述觸及「再現」媒介，為何是「華語語系」(sinophone)？請注意，文中，我們將相關理論基礎與帝國主義統治後個別使用殖民國家語言的情境，進行比較，而非類比；這些國家包括英國統治後的大英國協成員國：南非、印度、新加坡等。我們指出英語世界的後殖民理論問題，說明華語語系與之同異之處，而台灣的原住民如何「繞境」華語語系，翻轉或協商，在華語語系的書寫追尋其承載的特有生活世界與社會制度，乃至召返自己的族語獨特性，使用非語言的再現形式表達其內隱知識。

⁵⁵ 談雍雍，〈「不會記住你名字」宅神酸新發言人 網轟：看不起原住民〉，(來源：<https://news.tvbs.com.tw/industry/954853>，2019年3月5日)。

⁵⁶ 同註34。這段話見該書的內容簡介，可知其重要性。

在表述所謂後殖民論述立場與原住民文化的矛盾之處，或者是對華語語系的繞境之時，本文所提及的原住民的名字確實都是單一的、個別的，他們之所以能用來論述其個別所屬的族群文學與文化，是因為目前他們是我們看到最有代表性者，而惟有如此，論述方始得以進行。然而，這並不是說，任何一位擅長華語的任何一位族人的華語便可以順理成章地取代原體族群，甚至成為替族群說話的代言人，這是為什麼本文在華語語系之外，更提出了生活世界、族語書寫、內隱知識等再現。本文正是要揭示如何以少數去面對隱含著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的理論概念，並讓出台灣的「從屬層」說話的空間，讓台灣原住民說話。我們希望能突顯想以華語語系框架思考來是一種「繞境」，而不是「取代」，藉此避免以華語凌駕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的自相矛盾。

本文也指出，如同支持跨國資本家，後殖民主義宣示離散的必然性，甚至進一步美化文化混雜現象，完全忽略其可能帶來的危機。儘管世界原住民族的人口數、或者是以現代性為量尺定義的進步生活，原住民族的確都處於邊陲，是為弱勢族群，但他們卻總是能適時為總體人類反抗資本主義、消費主義、非人道，以及損害人類文化生態等種種趨向，提出針砭，並且立身實踐。雖然，問題永遠存在著：弱勢地位的人發聲，有誰會聆聽呢？在這些方面，我們認為台灣原住民族的回到家園、部落重建、文化振興的表現，堪為世界典範。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一、專書

- 王德威、季進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
-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台北：聯經，2016年）。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年）。
- 江寶釵，《文化全志·卷十二·文化志·文學篇》（南投：台灣文獻館，2009年）。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
-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17年）。
- 陳瑞麟等編，《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台北：麥田出版，2016年）。
- 奧威尼·卡露斯（Auvinni Kadresengane），《神祕的消失：詩與散文的魯凱》（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
- 達德拉凡·伊苞，《老鷹，再見》（台北：大地文化，2004年）。
- 邁可·博藍尼（Michael Polanyi）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台北：商周出版，2004年）。

二、期刊論文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台灣原住民族研究》2卷4期（2009年12月），頁1-37。
-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5期（2006年7月），頁1-4。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第107期（2011年6月），頁5-14。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芻議，或，「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翻譯專輯小引〉，《中外文學》36卷2期（2007年6月），頁13-17。

史書美著，吳建亨、劉威辰合譯，〈何謂華語語系研究？〉，《文山評論》9卷2期（2016年6月），頁105-123。

季進，〈華語文學：想像的共同體——王德威訪談錄〉，《渤海大學學報》30卷4期（2008年7月），頁58-64。

邱貴芬，〈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中外文學》23卷11期（1995年4月），頁141-147。

三、學位論文

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從自我生命經驗暨其書寫探討布農族語文學創作〉（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四、研討會論文

魏貽君，〈書寫的文字政變或共和？——台灣原住民文學混語書寫的意義考察〉，收於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2005年），頁283-312。

五、報紙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聯合報》，2006年7月8-9日，E7版。

六、網路

TJIMUR，〈解碼·蒂摩爾古薪舞集〉，（來源：<https://www.tjimur.com/3529930908-3392225705292461.html>，2019年2月11日）。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字〉，（來源：<http://www.cclc.hss.ntu.edu.sg/events/TanLarkSye/Pages/DavidWang.aspx>，2019年2月25日）。

施曉光，〈炎黃子孫？孫大川：我不是〉，《自由時報》，（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86552>，2019年2月15日）。

莊周，《莊子·天下篇》，（來源：<https://ctext.org/zhuangzi/tian-xia/zh>，2019年2月25日）。

郭志正，〈夢想編舞家「布拉瑞揚」〉，（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fFqVsBFk0>，2019年3月15日）。

雲門，〈布拉瑞揚·帕格勒法〉，（來源：<https://www.cloudgate.org.tw/front/staticPage/pages/about-bu>，2019年3月20日）。

維基百科，〈目的論〉，（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E%E7%9A%84%E8%AB%96>，2019年2月26日）。

維基百科，〈馬躍·比吼〉，（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8%BA%8D%C2%B7%E6%AF%94%E5%90%BC>，2019年3月5日）。

談雍雍，〈「不會記住你名字」宅神酸新發言人 網轟：看不起原住民〉，（來源：<https://news.tvbs.com.tw/industry/954853>，2019年2月26日）。

英文書目

一、專著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Cobo, Jose R. Martinez,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7).

Geertz, Clifford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Goldie, Terry, *Fear and Temptation: the Image of the Indigene in Canadi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Literatures*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Guha, Ranajit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all, Thomas D. and James V. Fenel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Globalization: Resistance and Revitalization*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 Healy, J.J.. *Literature and the Aborigine in Australia*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9).
- Nkrumah, Kwame,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lson, 1965).
- Schouls, Timothy, *Shifting Boundaries: Aboriginal Identity, Plural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Government*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3).
- Scott, Kim, *That Deadman Dance* (U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2).
- Shepherd, J.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ommer, Doris, *Foundational Fictions: the National Romances of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0).
- Williams, Patrick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 Wright, Alexis. *The Swan Book: A Novel*. (NY: Atria Books, 2016).
- Vizenor, Gerald Robert, *Native Liberty: Natural Reason and Cultural Survivanc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二、期刊論文

Byrd, Jodi A. and Michael Rothberg, “Between Subalternity and Indigeneit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3, no. 1(2011), pp. 1-12.

Cook-Lynn, Elizabeth, “Who Stole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vol. 12, no. 1(1997), pp. 9-28.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Robert Brinkley trans., “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 *Mississippi Review*, vol. 11, no. 3(1983), pp. 13-33.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no. 2 (1994), p. 331.

Gu, Ming Dong, “Sinologism, the Western World View, and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5, no. 2(2013).

Hu, Xiaoming, “Shif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n the Recent Ideological Trend of 'Counter-West Centralism'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 1, no. 1(2007), pp. 135-161.

Shih, Shu-Mei,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vol. 126, no. 3 (2011).

Shohat, Ella,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no. 31/32 (1992), pp. 99-113.

Wolfe, Patrick ,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8, no. 4(2006), pp. 387-409.